



# 以系統觀探究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

陳儀謙、鄧心怡、陳文儀



## 壹、前言

隨著全球化的人口遷移，新移民女性人數逐年增加，促使臺灣成為一個多元文化融和的國家。根據內政部戶政司及內政部出國及移民署統計，截至 2011 年 11 月止，全國新移民人口已達 457,949 人，其中新移民女性人數按國籍總計 150,411 人，而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人數合計有 307,538 人。2011 年 1 月至 11 月止，本國總結婚對數為 146,416，其中外籍與大陸籍配偶有 19,622，占 13.4%。而國別籍最多的前三名，分別是大陸、越南與印尼。由上述可見，臺灣社會人口結構上的改變，對人們生活的每個層面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衍生出來許多衝擊現有社會結構的問題，例如：生活適應問題、婚姻問題、家庭問題、就業問題、子女教育問題等，均形成臺灣社會的新挑戰（陳秀珍, 2009）

新移民女性多因原生國之家庭經濟因素而選擇嫁到臺灣，這些有著與臺灣不同的語言、文字、歷史背景、生活習慣、風俗文化的新移民女性，當進入一個的新的文化脈絡下，即產生生活適應上與溝通問題上的瓶頸。反觀到臺籍男性，在文化與媒體的衝擊

下，對於與新移民女性的婚姻關係也產生相同的問題。根據夏曉鵬（2001，頁 155）指出，媒體建構外籍新娘現象的共通主題是：「他們的先生是社會問題的製造者……『外籍新娘』作為一種『社會問題』幾乎已成為公論。」在兩者的文化差異與語言隔閡，加上處於非主流文化下的處境，而引發出家庭暴力的事件層出不窮。

不論是國內或者是國外，家暴都是一個極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中華警政研究學會（2011）發現，截至 2009 近八年之統計數據顯示，新移民家庭暴力事件呈現增加的趨勢；同時，在被害人的國籍別中，以大陸籍被害人的比例最高，越南籍次之。

有許多數據證明，婚姻暴力中女性受害機率比男性高得許多，從內政部家庭暴力委員會的統計資料（2010）中，就性別與籍別來分析被害人遭受家暴的新移民，在外國籍總計 4449 人中，男性有 64 人占 1%，女性有 4325 人占 97%；在大陸籍總計 4023 人，男性有 55 人占 1%，女性有 3942 人占 98%。由上述可見，新移民女性被害人的家庭暴力防治措施至今都是至關重要的議題。固我國對於新移

民女性提出多項的保護措施，如在 2003 年 5 月 7 日訂定執行「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措施」，於 2005 年 1 月 1 日開始，除原有政府計畫會計預算外並每年補助 3 億元，為期 10 年，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加強照顧輔導

工作，並且內政部（2009）訂定了「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以女性新移民個人及家庭之權益。而國內針對新移民女性的研究也逐漸增加。

表 1 婚姻暴力事件通報被害人籍別統計

單位：人、%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合計
本國籍非 原住民	22783	24335	25601	31172	30060	31320	31239	34335	230,845
	88.0	86.9	80.9	78.8	77.6	77.3	72.6	71.7	78.2
本國籍原 住民	606	818	1354	1423	1717	1756	1778	2079	11,531
	2.3	2.9	4.3	3.6	4.4	4.3	4.1	4.3	3.9
外國籍	653	973	1432	2045	2472	2777	3458	3932	17,742
	2.5	3.5	4.5	5.2	6.4	6.9	8.0	8.2	6.0
大陸籍	696	1210	1552	2091	2154	2382	2786	3239	16,110
	2.7	4.3	4.9	5.3	5.6	5.9	6.5	6.8	5.5
港澳籍	6	5	17	14	7	10	19	28	106
	0.0	0.0	0.1	0.0	0.0	0.0	0.0	0.1	0.0
無國籍	0	2	28	43	65	33	44	40	255
	0.0	0.0	0.1	0.1	0.2	0.1	0.1	0.1	0.1
不明	1160	674	1676	2776	2282	2216	3718	4255	18,757
	4.5	2.4	5.3	7.0	5.9	5.5	8.6	8.9	6.4
合計	25904	28017	31660	39564	38757	40494	43042	47908	295,34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註、資料來源：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2010，<http://dspc.moi.gov.tw/mp.asp?mp=1>。瀏覽日期：2011.2.28

註：採自「女性新移民家庭暴力被害人警政系統服務之實施現況、困境與分析」，孟維德，2011。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委託研究，頁 12。

反觀到新移民女性家暴事件中的臺籍男性，在現代社會框架下常被視為家庭暴力中的加害人。再者，加害人的暴力行為被視為因個人身心病理因素或認知上的父權心態所致，需接受專業人員輔導與教育的「協助」來導正偏差的暴力認知與行為。在這種個人歸因的理解架構下，加害人的聲音在家暴防治體制中是不被聽見與理解的（引自王美懿，

林東龍 et al. 2010）。有研究指出，婚姻暴力中的加害人同時也是被害人，相信他們也一樣值得我們去關心。（李靜宜，2001）潘淑滿（2007）也指出婚姻暴力中有許多男性加害人也是受害的一方，但因為面子關係以及傳統觀念對男性面子文化的重視而不願報案及外揚，這樣的情況，反而使得男性成為父權體制的受害者。

根據陳若璋（1992）指出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主觀經驗認為家庭暴力的發生是日積月累的結果，與李宜靜（2001）的研究，由家庭暴力加害人的觀點亦認為家庭暴力是一連串事件的反應累積的結果雷同。由上述可知，家庭暴力並不像主流家暴理論與處遇模式將家暴事件進行個人歸因，其發生的過程是與人、事件和脈絡有所關聯。而聚焦於新移民女性與臺籍男性婚姻中暴力事件的脈絡因素時，更應留意到範圍更大之脈絡中，不同因素的交互作用。

## 貳、婚姻暴力與家庭權力

### 一、早期論述—歸因於單方面

關於婚姻關係中的暴力事件，國內早期的論述，較傾向聚焦於加害人個人的童年經驗，或者心理特質等等因素，即容易將婚姻暴力歸因於個人因素，而不是以家庭系統，或者資源及次文化等等觀點加以探討（潘惠雅，2005）。以將問題視為特殊化個人議題的心理動力觀點而言，會認為婚姻暴力是「個人的」以及「女性的」議題；而心理社會分析論者，面對婚姻暴力事件時，則傾向進行「社會的」與「男性的」問題（吳柳嬌，2005）。即早期比較傾向對婚姻暴力事件中的其中一方作歸因和論述。

而新聞媒體對婚姻暴力的觀點，從一九九三年，國內發生驚動社會的板橋鄧如雯殺夫案，開始引起社會各界對於婚姻暴力的關注。而此事件到一九九八年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之期間，新聞媒體對婚暴的關注雖然增加，但卻普遍較聚焦於女性被害人的個人

因素，例如未能扮演好女性自己的角色，或者因私欲或者不檢點而遭受暴力對待。大眾媒體面對婚姻暴力事件時，時常將受害女性的人格特質加以特殊化，或者將性別暴力中的結構加以個人化等等，經由這些方式，暴力事件中的男性加害人之行為受到合理化（羅燦燦，1997）。

而在婚姻與家庭的暴力防治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工作人員，對於婚姻暴力的歸因，男性社工常認為父權社會給予男性一個需要負擔家庭經濟的責任，但當女性開始出外工作，男性無法在經濟上佔優勢時，基於面子與權力喪失的感受，即以暴力對待配偶；而女性社工則以兩性在婚姻暴力中的受暴狀態來看，多認為女性基於生理因素，受暴程度常較嚴重，而較能同理婚姻中女性的不利（潘淑滿，2003）。

早期針對婚姻暴力的論述，比較偏向以微觀的方式檢視婚姻暴力現象的成因，並且關注的焦點常只在暴力事件中一人，在解釋上，偏向歸因於個人特質及行為，而忽略了婚姻當中的另一方，以及更巨觀層次的，社會及文化脈絡等因素所帶來的影響。

### 二、婚姻暴力案件中的性別之差

婚姻當中的暴力事件，加害人大都以男性居多。以內政部針對國內近三年的家暴事件通報的調查來看，加害人為男性的統計數，就佔了百分之八十（內政部，2011）。而檢視近三年之婚姻、離婚以及同居關係暴力中的被害人性別統計，可發現女性受害人佔所有受害人之百分之八十九（內政部，2011）。由上述統計資料可見得，國內婚姻

及家庭暴力案件中，性別為一項重要的元素。

在婚姻暴力的通報數據中，顯示性別佔了極大的影響力，追究其可能原因，源於社會文化的因素可供考慮。學者朱柔若與吳柳嬌（2005）由社會文化結構的面向進行考慮，認為社會價值觀當中的兩性不平權的價值觀，在婚姻暴力的現象中，反映的是配偶關係當中的權力以及資源的不平等，且使配偶當中的女性較易成為受害者。

### 三、婚姻關係中的權力與暴力

臺灣深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傳承著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思想。由於在傳統上傾向男尊女卑的社會背景中，男性為要角，而女性相對而言是受支配的，如此權力不等的社會角色，會反映在婚姻關係當中，會成為一種控制與剝奪的機制（謝臥龍，2007）。

由於傳統社會對男女的家務分工概念相當明確，使得在上述的社會背景中，男性在生理上，與經濟上都較為優勢，男性也被認為是有責任保護妻子，以及有權利管教妻子，而妻子在如此權力不等的狀態下，依然遵從傳統社會的價值觀，認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對於自身的處境也只能接受。這使得許多婚姻暴力中的受害人，仍選擇跟加害人繼續生活（朱若柔、吳柳嬌，2005）。

當婚姻中的兩方都遵循著社會傳統的思想與價值觀，這使得婚姻關係中男性權力高於女性的關係就好似稀鬆平常的事，當有一天女方開始不接受男方的控制時，因而男方的權力受到了挑戰，引起了暴力的產生。因此，婚姻關係中產生的衝突，主要可歸因於權力控制，而婚姻關係中的決策權及控制都

是可能引起衝突的原因（吳孟純，2011）。

吳柳嬌（2005）在對婚姻暴力的成因及處遇進行的研究中，經由訪談資料發現，針對臺灣的婚姻暴力現象，資源論和社會控制論皆有解釋力。也就是當先生負擔家計在外工作，而妻子為全職家庭主婦時，先生相對來說握有較多的資源，因而在家中也握有較大的權力。而當雙方有摩擦產生時，先生較可能以暴力使妻子讓步。

而資源論當中的地位不一致說，則認為前述的資源論，其適用範圍僅限於男性握有較多資源的狀況。而當情況反過來，是妻子的資源較充足時，先生對於自己在婚姻中的主導地位感到危機的狀況下，可能將暴力行為作為自己的資源，來面對妻子（吳柳嬌，2005）。但過往傳統社會當中的父權宰制，在現代社會中並非完整地保存和延續下來，當兩性之中的女性越來越沒有參與在父權宰制的合作與共謀中時，暴力行為即為男性採取的一種回應。這樣的現象大都發生於家庭或者婚姻關係之間（朱若柔、吳柳嬌，2005）。

王曉丹（2009）針對越南婚姻移民婦女在婚姻中的暴力事件研究，提到夫妻之間關係不對等的情况中，對於權力較大的一方，應該對於此種權力關係有所認知，並且於各種決策中應避免濫用權力的不對等，否則容易成為一種暴力。

## 參、系統理論基礎

### 一、系統是一個整體

家庭系統是由家庭成員所形成的組織，

這個組織被視為一個整體，整體並非是將個別成員加總，而是在成員間多了動態關係而具複雜性，不僅相互依賴也互相影響，彼此產生共變（Covary），因此家庭系統中的因果關係是循環且多面向的。因此，在瞭解系統的運作時，需要以一個整體的系統觀點來看待，而不可就單一個體或成員視之（I. Goldenberg & H. Goldenberg, 1996／翁樹澍、王大維譯，1996; D, Becvar & R, Becvar, 1999）。

Kragh 與 Huber（2002）認為家庭系統觀不是分開處理家暴、婚暴、婦女、兒童，而是從家庭文化脈絡的角度來對家庭整體系統的改變，看重家庭成員個人與家庭的能力，而非受暴者的病理化與汙名化，並促成個人與家庭系統整體的改變（賈紅鶯，2011）。王瑞霖（2010）研究指出從整體婚姻互動來看，針對受訪者之婚姻經驗以及暴力所造成的心情跟期待層面而言，男性加害人或許也可能是受害者，因此對於家庭加害人輔導課題中，如何關注其家庭互動層面以及家暴法介入之心情，進一步理解家庭暴力發生的整體脈絡，來加以協助。

## 二、回饋、訊息和控制

系統是一直不斷地變遷，而不是靜止的過程。其動態過程的意義，其顯示系統具有恆常變動、生生不息的特性（瞿海源等，1996）。回饋即是系統的調節機制，用來維持穩定的狀態，而能同時達到監督系統達成特定的目標。回饋迴路包含負向與正向，能發揮重建安定性或增加衝突。（I. Goldenberg & H. Goldenberg, 1996／翁樹澍、王大維

譯，1996）不論系統的大小、型態與屬性，系統的生存與平衡，需仰賴內在結構與外在環境都處在均衡與和諧的狀態（蔡琰，1994）。

曾慶玲與周麗端（1999）指出婚姻暴力家庭的系統大多都是高度封閉。由於外在環境、家庭背景與人格特質等因素，夫妻間的次系統產生高度的摩擦，促使其他成員採取「負向的回饋」做回應。王瑞霖（2010）指出家庭暴力加害人婚姻衝突頻繁以及雙方因應能力不佳的情況之下，使得雙方間爭執開始升溫，以至爆發暴力的情況。檢視家庭在發生暴力前的互動模式確實反應出一恆常的系統回饋過程（陳若璋 1992），當家庭有誤解產生時，若是其被強化，爭論可能會失控，越來越激烈下，甚至會發生暴力行為，此時若能掌握住家庭失衡的機會協助打破原先的恆定，而重建新的恆定（翁樹澍、王大維譯，1996）。家庭暴力治法的合宜介入與心理輔導如同打破夫妻間原本穩定的暴力循環，也改變暴力的互動模式，促使彼此深入去思考夫妻間情感的本質、未來家庭衝突有益而正向的解決策略及婚姻維繫的意義與意願（王茲總，2008）。

## 三、遞迴

遞迴是指持續進行中的相互影響，以及系統與關係中的成員彼此需共同分

擔責任。不同傳統的線性因果觀點，系統理論擺脫指責與內疚的觀點，而以循環與相互作用的角度，讓家庭理解是許多因素共同創造了這個狀態。對家庭有意義的是放在此時此刻，去瞭解關係中的成員，是如何希

望事情變得不同。

系統不去討論暴力的線性關係，而是將研究焦點放在暴力事件發生的

過程（陳若璋，1992）。Street（1994）認為依家庭系統運作的觀點而言，家庭經過長期的交流、爭執、妥協、重組的互動之後，將建構出適合他們生存的互動序列，然而，此種互動序列卻經常演變成家中唯一的互動模式，反而導回成為問題的根源（游淑華、趙淑珠、陳金燕，2007）。許多研究顯示，家庭暴力有其循環期，或許，爭執因應並非暴力發生的唯一因素，而是家庭暴力的發生有其背後個人、家庭以及社會脈絡之因素（王瑞霖，2010）。Stordeur & Stille（1989）認為依照家庭系統觀點，暴力是關係或動力失衡的徵兆，此理論假設系統內的個體都會影響系統的動態平衡，即家庭系統內的個別成員必須維持家庭的動態平衡。這也意味，家庭暴力的發生，有時並非是單一的個人問題，而是家庭成員必須共同分擔責任（王茲總，2008）。Dash 等（2000）認為當加害人的暴力或控制行為有所改善時，極可能提升夫妻的生活品質或互動關係。

新移民女性的跨國婚姻，涵蓋許多文化的價值體系、社會適應的狀況，都會在有形無形當中影響夫妻適應的歷程與結果。賈紅鶯（2011）認為家族治療以其系統的、整體的、注重文化脈絡與循環的觀點，在國外已被認為是家暴工作重要取向。但是國內對於家族治療訓練缺乏，各個專業機構缺乏系統與合作的方法，造成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現象。經由建構系統取向的家暴工作，包括受暴婦女、孩子與加害者的心理輔導及不同

專業系統之間對話與合作等，更待重視。

## 肆、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的影響層面

### 一、文化層面

#### （一）臺灣男權

臺灣男人為何要娶新移民女性呢？其原因不外乎，娶不起臺灣女性及外籍女性比較順從。為何臺灣男人要選擇順從的女孩做為配偶呢？原因來自於臺灣男權奠基於傳統中國社會的父權主義，典型「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觀念。傳統父權觀點，認為男人必須負責家庭經濟的重擔，而女人要負責照顧孩子、公婆、處理家中的勞務，將家庭照顧好，能讓男人安心在外工作。早期臺灣女性要求「三從四德」，但隨著兩性平權的觀念興起，臺灣女性教育水準提高、經濟獨立、社會地位提高，使得臺灣低社經水準的男性難以找到心目中「順從」的女性。

在臺灣傳統的農村社會中，男性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傳宗接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就顯示傳統社會對於血緣延續的重要性。因此，臺灣男性只要一到了適婚年齡，家中長輩便開始催促其結婚生孩子，使得血脈得以傳承，在期間，男性往往會感受到來自於家族中巨大的壓力。在這樣有關於結婚的文化認知基模出現時，不得不結婚的壓力隨之浮現，對婚姻的思考可能導致結婚這個婚姻形式的存在比婚姻本身的品質更為重要的現象出現（施健彬，2005）。仲介介紹新移民女性時多以乖巧順從、賢慧等字眼

來形容東南亞地區女孩子，這些形容詞是符合臺灣男性對傳統社會女性的期待，甚至是身旁就有親戚好友就有這樣「賢慧」的新移民女性，因此，從偏遠的國家尋找配偶就成為臺灣男性的選擇之一。

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中，依然存在著根深蒂固的男性權威思想。田晶瑩、王宏仁（2008）研究指出臺灣男性選擇外籍新娘的原因，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因為臺灣男性認為新移民女性很符合傳統社會的婦女美德，加上配偶娘家處在落後偏遠的地區，使得他們能夠發揮傳統男性的地位優勢。

然而，若將這情況放在系統中，其實會發現新移民女性的順從並不只是因為他們自身的環境背景所造成的因素，而有可能是新移民女性來到陌生的臺灣國度，不懂語言、沒有親友、沒有身分證，完全只能依靠臺灣的丈夫來生活。倘若夫家的家庭又是傳統上男女家務分工的概念，新移民女性一到臺灣就被教育遵守這樣的行為模式，這會使得新移民女性成為遵守臺灣早期「婦德」傳統的角色，這樣的權力關係使得臺灣男性能掌控這些新移民女性，而新移民女性也只能順從丈夫的決定。

## （二）社會排除

許雅惠（2008）也提出，臺灣社會更有許多以「非我族類，不能信任」、「搶本國人工作，不能包容」、「會生不會養，將威脅人口素質」等排斥性以及歧視的眼光在看待新移民。當社會以這樣的眼光看待新移民女性，會使新移民女性在社會上處於一個「次等他者」的定位。而這樣的標籤，反映在政

府部門對於新移民女性的政策層面，多為「健康保健」以及「犯罪預防」的面向，比起其他層面，更多的是以管理為重（林姿君，2007）。國家的政策會影響人民的生活。上述的政策實施方向，反映在新移民女性於臺灣社會的生活經驗中，常遭遇及感受到的，是各類型的社會排除。

朱柔若與孫碧霞（2010）針對印尼籍以及大陸籍配偶在臺灣社會的社會排除經驗之研究中，發現兩者皆有社會排除的經驗。其中印尼籍配偶較常在經濟、社會關係，以及文化方面經驗到社會排除，而大陸籍配偶則較多在政治及福利制度上感受較多。

社會排除對新移民女性可能帶來經濟收入或補助上的匱乏、社會關係網絡的限制，以及族群的歧視等等狀況。而社會排除與新移民女性在家庭生活適應方面，也顯示出有負向的關聯（朱柔若、孫碧霞，2010）。先前針對婚姻關係中提及對資源的論述中，可得知資源與權力之間的聯繫，以及此聯繫與婚姻暴力的關連（吳柳嬌，2005）。倘若在政策面向上，能與予政府的服務及社會支持等資源，對於協助新移民女性在避免社會排除，進而影響其家庭生活適應，是較有益處的結論。

## 二、國際婚姻遷移的仲介模式及其影響

國際遷移包含就學、就業以及婚姻等等類型，而其中因婚姻而遷移的人口，以女性為大宗。隨著經濟的南向政策，臺灣與東南亞國家的國際通婚增加。常見的方式是，經由仲介介紹下，臺灣男性到東南亞當地相親，臺灣男性往往對當地文化、風俗習慣不

熟悉，加上語言上的限制，使得雙方的溝通都是有賴於翻譯人員，因此挑選對象的選擇上有賴於一些外在變項，例如外表、身材。經過了幾次的見面後，就開始談論嫁娶事宜，就好似四、五十年代的早期臺灣社會，認為結婚後在培養感情即可。由婚姻介紹所等機構作為媒介，以男性客群的喜惡為主，用商業化的經營方式介紹東南亞國家的女性（蕭昭娟，2000）。

蕭昭娟（2000）也提出，這樣的婚姻模式在現代代表著種族與社會意義，表示此婚姻關係當中的女性來自低開發國家，而男方則來自比較先進的國家。此外，這種仲介新移民女性婚姻的模式，著實在大眾心理造成深遠的影響，進而形成一種偏見。由於仲介將「外籍新娘」的商品化、見面沒幾次就論及婚嫁、再加上費用的支出及給予娘家的費用，花費動輒四、五十萬，使得許多人將新移民女性視為花錢「買來的」，這樣將「外籍新娘」商品化的思想，對新移民女性在臺灣的處境無疑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加上早期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所知不多，因此藉由媒體的報導形塑出對新移民女性的印象。但由於媒體需要收視率，報導都傾向能吸引大眾的悲情、同情的題材，並加以使用聳動的標語，例如「假結婚，真賣淫」、「外籍新娘造成社會問題」，使得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的觀感不佳。

在蔡臺鴻（2009）的研究中也指出：臺灣社會對於女性新移民的認知和歧視是來自某些學者專家與專業人士，並表現在社會大眾、政府、媒體甚至是專家學者對於新移民女性的評價上，再經過媒體與社會傳播所形

成的社會「建構」過程。在夏曉鵬（2000）中則反映的這個現象，這些建構而來的負向訊息，被民眾當成是新移民女性的個性，如果生活中有一個好的新移民女性，他們會認為這是一個「例外」。倘若生活中剛好就是有這樣的個例，他們會認為「啊！你看吧！他們就是為了錢而來的」，換言之，社會大眾普遍將新移民女性形塑成一個「為了錢而來臺灣」的人。

甚至於大多數與新移民女性通婚臺灣家庭及其周遭的親友，相當程度地把負向的報導，內化為他們對「外籍新娘」的認知。此類型婚姻關係中的部份臺灣男性，以及其家族成員，因著將新移民女性商品化的思想，認為這樣的關係為買賣關係，忽略跨海來臺的新移民女性的妻子或者媳婦等等身份，容易將之視為「工具性」的家人（林姿君，2007）。而「工具性」所帶來的影響，是男方的家庭可能將新移民女性設定為家庭中需要負責照顧老人家、料理家務，以及傳宗接代等等的角色。

另外，商業化的婚姻關係，除了讓來臺的新移民女性落入一個照顧家裡的工具性角色之外，對於男性而言，生理的欲望也是他在婚姻仲介過程中決定的要素。通常婚姻講求溝通與認識，然而現代的外籍通婚現象卻是一種現代功利主義下的產物，整個婚禮從籌備到完成，往往就在短短的數週之內完成（鄭雅雯，2000）。

這樣的前提，帶來的是男性對於新移民女性的「綠帽焦慮」（沈倬如，2003）。另外，結婚初期，擔心新娘逃跑、詐財，也常是男方及其親友最大的心理負擔（夏曉鵬，



民 89)。有些家庭在媒體的渲染報導下，自然產生「新娘落跑恐懼症」或稱「逃妻恐懼」，進而對新移民女性來臺後的生活採取限制的手段，如限制妻子的交友、外出狀況，甚至工作選擇等等（沈倬如，2003）。基於這份不信任，在家中有貴重物品或金錢丟失時，也首先會對新移民女性產生懷疑（林姿君，2007）。

蕭昭娟（2000）在研究中提到，如此隨全球化的經濟資本活動而來的女性遷移以及異國婚姻的特殊現象，可能對臺灣社會中的家庭關係，以及婚姻型態都有所影響。先前的論述中，即可以檢視到國際的婚姻遷移之仲介模式，帶來對婚姻的商業化觀點。而討論新移民女性所處的現況時，也要將社會偏見與歧視納入考量中，因為新移民女性所面對的家人、丈夫可能就是因為偏見而不友善，使得其處境更顯勘憐。進而影響到新移民家庭以及婚姻關係當中的角色定位、權力結構和互動模式。

### 三、現行政策層面

#### （一）語言教育

當前有許多以新移民女性為對象的補救教育，例如內政部頒布的「新移民女性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各縣市政府實施的「新移民女性成人基本教育班」，就是鼓勵新移民女性能參與識字班，學習臺灣的語言，融入本土文化。對於一個來到陌生國度的新移民而言，為了能讓社會、夫家接納，就必須學習接受這樣的輔導教育。但這善意的輔導政策，其實也隱含另一種文化的壓迫，「你

進入臺灣的社會，就必須學習臺灣的語言、文化及生活方式」。這其實是強調新移民女性「必須先瞭解、適應、融入」於臺灣社會中，而其背後意涵則是因民族意識形態而造成的族群偏見與歧視（譚光鼎，2001）。

何青蓉（2007）研究中提到在針對成教班、外配專班和補校教師的質性研究上，有老師憂心新移民女性教養子女，係出自於一種深怕臺灣被同化的危機意識，所以必須趕快強調跨國婚姻婦女教育。換言之，政府的輔導政策其實顯示了一件事，那就是自身民族的優越，因此新移民女性必須接受臺灣的教育融入社會當中，而不是臺灣接受多元文化，去尊重新移民女性他們自身的文化。

學者也批評，現在的教育講求多元文化，但實際上新移民教育的學習重點仍被侷限在識讀、家庭與親職教育中，政策目標仍被放在協助其獲得基本語文能力和溝通能力，以及提升夫妻溝通和親職教養之能力，看不出深刻的多元文化教育的內涵（何青蓉、丘愛玲，2009）。

#### （二）孩童教育

我國目前對於新移民女性子女有著許多的輔導對策，這樣的輔導策略其實也隱含了一種訊息「因為是新移民女性的孩子，所以教育要再加強」，這背後其實有著歧視新移民女性的含意在，認為新移民女性是屬於社會低階層且知識力不足，給予孩子的知識教育會不夠，所以要多輔導這些新移民女性的小孩，讓這些小孩的能力不會比不上其他學生。關於這種觀點，瞿海源（2006）指出弱勢族群的「問題」，其本質就是優勢族群有

問題。優勢族群宰制乃至剝削弱勢族群是造成社會問題的關鍵和根由。也就是說，當我們認為新移民子女要加強輔導時，其實就已

把他們問題化了，我們是用優勢族群的眼光看待他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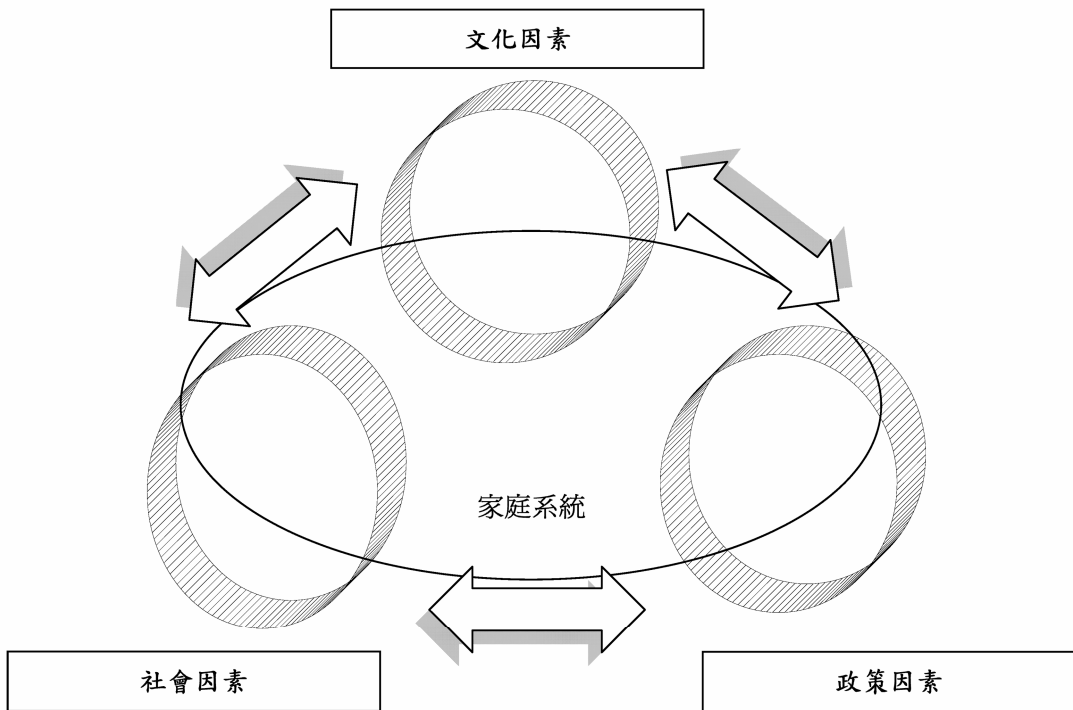


圖 1 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的系統觀

以系統觀來看臺灣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要將社會脈絡納入考量中。婚姻暴力最主要的在於家庭內權力不均，文獻顯示在婚姻暴力中男性權力總是大於女性的。在一個家庭中，會有權力不均等的現象，要談到在文化背景脈絡上，臺灣男性多是處在傳統男權社會下，被文化教育的更威權，以致於他們對新移民女性的期待是滿足他們成為家中的掌控者；而新移民女性來到臺灣後，由於人生地不熟、語言限制、無親友相伴，使得自己只能依靠著夫家，也被家中其他成員教育而變得「溫順、賢慧」。致使家庭中男性

權力更大的可能，不只是臺灣的文化上，也與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的觀感跟作為有關，社會大眾以負面評價看待他們，先行政策也「問題化」新移民女性及其子女，因此在社會對其不友善的眼光下，新移民女性的處境更加乏人問津，陷入了就算想求助也不知能找誰的窘境，而娶了新移民女性的先生要面對親友的質疑、自身的擔憂，也使得男性更加想掌控新移民女性。

在家庭中還要談到家庭其他成員，前面談到社會大眾對新移民女性有著偏見，這反應到家庭中所造成的就是其他人如何與新移

民女性相處，倘若其他成對新移民女性的相處模式也是將他視為「次等的」，就更弱化新移民女性在家中的地位了。整個家庭深受社會所影響，新移民女性在臺灣難以找到依靠，只能依賴丈夫，而丈夫害怕新移民女性離開就更加想要掌控她，卻不知這樣的掌控更會使她離開……。

## 伍、結論

本篇主要以系統觀觀點討論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以循環與相互作用的角度，探究出影響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的層面，主要在於婚姻關係中權力關係不均等所造成的，而造成家庭內權力不均等的原因，則來自多個面向，分別為文化、歧視與偏見、與現行政

策層面。家庭內促使權力不均的，還有家庭內的成員對待新移民女性的相處方式、及新移民女性缺乏資源幫助、丈夫害怕其離去等因素。

由於整個系統是屬於動態平衡，不停在交流著訊息，因此，新移民女性的婚姻暴力是由社會價值、文化、家庭成員的相處、新移民女性及丈夫的個人特質所交織而成，這些訊息不停在交流、互動，強化了家庭中男性權威的現象，進而促使婚姻暴力發生。

（本文作者：陳儀謙為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二生；鄧心怡為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二生；陳文儀為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研究所碩二生）

**關鍵詞：**新移民女性、婚姻暴力、系統觀

## 參考文獻

- 內政部（2011）。100 年我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統計。臺北：內政部
- 內政部（2011）。100 年度外籍與大陸籍人數統計。臺北：內政部
- 內政部（2011）。100 年度家庭暴力事件通報統計。臺北：內政部
- 王大維、翁樹樹譯，I. Goldenberg & H. Goldenberg 原著（1999）。《家族治療理論與技術》。臺北市：揚智文化。
- 王美懿、林東龍，et al.（2010）。「病人」、「犯人」或「個人」？男性家暴「加害人」之再認識。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 14（2）：147-193。
- 王茲總（2008）。婚姻暴力加害人處遇方案對於加害人家庭系統影響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臺北。
- 王瑞霖（2010）。男性親密暴力加害人婚姻互動與暴力經驗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嘉義。
- 王曉丹（2009）。法律論證事實的脈絡分析——以越南婚姻移民婦女之「家庭暴力」為例。法學新論，14，59-85。
- 田晶瑩、王宏仁（2006）。男性氣魄與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臺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

臺灣東南亞學刊, 3 (1), 3-36。

朱柔若、吳柳嬌 (2005)。行動主義、女性主義、社會學、與實務界的多元對話：臺灣婚姻暴力研究之檢討, *南大學報*, 11 (3-4), 1-16。

何青蓉 (2007)。成人識字教育的可能性。高雄：復文

何青蓉、丘愛鈴 (2009)。我國新移民識讀教育政策之問題評析與前瞻。《教育與社會研究》, 18, 1-31。

吳孟純 (2011)。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婚姻暴力之夫妻關係。臺北。線上檢索日期：2012 年 1 月 8 日。網址：[http://life.edu.tw/homepage/discuss/t-5-293.php?board\\_no=B000000169&seri\\_no=535&pageth=1](http://life.edu.tw/homepage/discuss/t-5-293.php?board_no=B000000169&seri_no=535&pageth=1)

吳柳嬌 (2005)。婚姻暴力的成因與處遇之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中山大學中山研究所，高雄。

李宜靜 (2001)。婚姻暴力加害人心理經驗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高雄。

沈倬如 (2003)。天堂之梯？—臺越跨國商品化婚姻中的權力與抵抗。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新竹。

孟維德 (2011)。女性新移民家庭暴力被害人警政系統服務之實施現況、困境與分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委託研究）。桃園，中華警政研究學會。

林姿君 (2007)。新移民女性對烙印覺知與因應策略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慈濟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花蓮。

夏曉鵬 (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0。

夏曉鵬 (2001)。「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3，153-196。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研究所，臺北。

陳秀珍 (2009)。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與照顧輔導之研究—以臺中市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臺中。

陳若璋 (1992)。臺灣婚姻暴力之本質、歷程與影響。《婦女與兩性學刊》，3，117 - 147。

曾慶玲、周麗端 (1999)。父母婚姻暴力對兒童問題行為影響研究。《家政教育學報》，2，66-89。

賈紅鶯 (2011)。家族治療的文化脈絡與靈性議題：家暴的困境、轉變與反思。《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0，124-149。

潘淑滿 (2003)。婚姻暴力的性別政治。《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195-253。潘雅惠

(2007)。婚暴婦女增權展能的學習—從女性主義教育學的觀點談起。《亞洲家庭暴力與性侵害期刊》，3 (2)，63-87。

潘淑滿 (2007)。親密暴力：多重身份與權力流動。臺北：心理。

- 蔡臺鴻（2008）。*外籍新娘的污名化—以新聞事件報導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
- 鄭雅雯（2000）。*南洋過臺灣：東南亞外籍新娘在臺婚姻與生活探究--以臺南市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花蓮。
- 蕭昭娟（2000）。*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
- 謝臥龍（2007）。部落原住民家暴受害者求助經驗及求助需求之探討。載於美和技術學院社會工作學系主編，*2007 弱勢族群社會工作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69-196〉。屏東：私立美和技術學院。
- 瞿海源（2006 年 3 月 28 日）。關鍵在於優勢族群。*中國時報*，A15 版。
- 羅燦燦（1997）。性別暴力與迷思再現，*性別與兩性研討會論文集*，〈頁 323-339〉。高雄：高雄醫學院兩性研究中心。
- Becvar, D. S. & Becvar, R. J.( 1999 ).Family therapy " A systemic integration. Boston : Allyn and Bacon .